

中国近代政治变革与思想解放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在这个前提下，马克思主义者也充分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特别是当社会发展到了即将发生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旧思想的枷锁严重地阻碍着人们的觉醒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思想解放就成为社会政治变革的前导，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制约着政治革新的程度乃至成败。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遇到了几千年来从未遇到的一系列新问题，随着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新知识的追求、探讨和宣传，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革，虽然都失败了，但再次证明了人们理性的高度决定着政治变革的成败和归宿。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到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讲的都是引进西方的“船坚炮利”。这种思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相当一批人所接受，于是出现了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对于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重大变革，因为在中国封建的法典上找不到要把外国人的“技术”拿来维护“天朝上国”的条文。于是引来了顽固派的一系列攻击，他们认为学习西方的“长技”不但解救不了清廷的危机，反而会败伦常、坏人心，使中国不成其为“礼义之邦”。可见，办洋务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要从理论上透彻地加以论证，使人们从封建传统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但是，很可惜，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大都不懂理论，他们手下也没有高水平的洋务理论家，他们培养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如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也没有在这方面作文章，他们注重的是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洋务派在和顽固派的论争中，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例如在关于海防、同文

馆的兴建、要不要修铁路等争辩中，很少从理论上提出问题。虽然洋务派最后还是战胜了顽固派，但这是一种“权力”压服，并非从理性上解决问题。洋务派官僚只知变“事”，不知变“理”。洋务运动缺乏真正的思想基础，更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所以，尽管李鸿章等人有权有势，也难免以失败而告终。诚然，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种不从理论上更新人们的思想，只知“摸着石头过河”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和洋务运动不同，戊戌变法则以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开始的。就在洋务运动后期，一些了解世界局势又善于沉思的早期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等人，就批评办洋务的不足，提出学西方的根本是变革政治制度，设议院，改官制。在他们的言论和著作中，反复介绍西方的议会、学校、财政以及各种制度。虽然这是一种传声筒式的介绍，但毕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甲午战后活跃起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较王韬等人深入了一步。他们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将他们了解的那一点西学经过消化吸收，和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相结合，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古香古色地鼓吹维新变法，在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飓风”。与此同时，严复在天津努力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著作，使知识界耳目一新。紧接着，维新志士开始办报刊、开学堂、建学堂，论述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终于促成了 1898 年的“百日维新”。

然而，戊戌变法是短命的和不彻底的。这从他们的理论宣传上也可以找到原因。康有为等人在理论探讨上取得的最主要成果是变法才能救中国，人们接受得比较多的也是“变”的思想。如何变，变以后出现什么后果，他们很少论及。加之这些人当时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中国旧势力认识不足，变法的艰巨性更未想到。他们所写的理论著作，影响面也是有限度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主要波及于上层士大夫知识分子中；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较通畅，影响面也限于部分知识界。严复的译著，读的人也有限，《天演论》的真正社会影响是在 20 世纪初年。谭嗣同的《仁学》具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宣传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抨击清廷的民主性，但秘未传世，戊戌变法之后才出单行本，而且康有为等人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封建的传统理论从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但由

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他们却千方百计地论证维新变法如何符合封建圣人们的教诲，他们的思想主张如何与封建理论合拍。当守旧分子揭穿他们的老底之后，康有为等除了搪塞，就别无良策了。这种理论探讨得不深入，限制了康有为等维新变法思想的发挥，也决定了戊戌变法的软弱无力。退一步讲，就是康有为等人这种不深入、不完备的维新变法理论，其影响面也不大。这种思想解放的幅度，当然不可能对抗深化到一切领域的顽固而强大的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所以，戊戌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是有限度的，作为其政治反映的“百日维新”就更难尽如人意。

如果说戊戌时期的思想启蒙是以温和的、合法的、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包裹在孔孟儒家思想中的方式出现的，那么，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则是激烈地、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因为在 20 世纪初年，清廷已经无力控制局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了一支队伍，西方思想文化大量传入中国，特别是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大辩论，这就促成了继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来的第二次颇具规模的较自由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随之而来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结束。思想解放对政治变革的促进作用，在辛亥革命时期表现得很充分。但是，如果客观地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既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又为孙中山的失败埋下了祸根。当时，人们提出的研究课题虽然很多，但真正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说明了问题并为广大民众理解和接受的仅是“革命排满”，其他都是“夹生饭”。所以，清廷一倒，革命党人的绝大多数都迷失了方向，连章太炎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鼓吹起开明专制来了。那个不是满族人、又有实力、善于耍两面派的袁世凯成了多数革命者向往的“强人”。非袁莫属”不仅是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分子的心声，南方的革命派中也很少不人云亦云。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孙中山的被迫让位就势所必然了。辛亥革命只能把皇帝赶跑而建不起民主共和国。政治变革的程度再次受到了人们观念更新程度的制约。

五四运动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当袁世凯大做皇帝梦的年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了。从刊物的

内容来说，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虽然只是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对孔学和维系封建社会制度的旧礼教三纲五常、旧道德忠孝节义的尖锐批评，不能不使人为之震动。这个杂志出了一年 改名《新青年》 并号召青年要有新的觉悟，担负起时代的使命来。当时青年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开始认识自己，并有少数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战后世界革命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爆发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民主思想的觉醒，不可能有民族意识的高涨，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当作彻底改造中国的道路。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实现的。

总之 近代历史充分表明 如果没有理性的解放 观念的更新 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变革。

中国近代改革家的开放意识

发展过程

近代改革家的开放意识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具体可分为鸦片战争后的萌发期、洋务运动中的形成期和戊戌维新运动时的扩展期。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自我反思的起点。传统的观念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西方是“蛮夷小邦”。但鸦片战争的事实是“蛮夷”击败了“天朝”，这种思想震动是巨大的，有头脑的人不得不去问一个为什么，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思考，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外的情况，还主持编辑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目的就是重新认识西方的“蛮夷小邦”。他大胆购买了外国船舰，要求道光帝与各国进行正常贸易，这些都具有对外开放的色彩。但林则徐作为清朝的大员以及当时的条件所限，还没有形成对外开放的观念。这种观念首先是在他的好友魏源身上萌芽的。魏源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必须改变，应该“师夷长技”。既要“师夷”，当然要对外开放。魏源提出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武器、练兵方法，创办军事工业和其他工厂企业，建议清政府在虎门划出一块地方，让外国人在这里投资办厂，派中国的有识之士进厂做工学习。为了“师夷”，魏源经过多年努力编著了《海国图志》，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精神食粮。和魏源同时期的徐继畲也初步改变了中外隔绝的陈腐观念，编著了《瀛环志略》，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同时大赞华盛顿创建美国的功勋，称其为“异人也”。富有改革精神的姚莹为获取世界知识，曾多次提审鸦片战争中俘虏的英国士兵，还参阅世界地图，研究西方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他批评守旧官吏闭关自守，坐井观天，不知西方为何物，这必定“误天下国家也”。总之，鸦片战争时期的有识之士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认识到了两点：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军事上是先进的，清廷要反侵略，必须把这种“长技”

想方设法学到手 二、中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世界 研究西方“天朝上国”的观念应该改变。这种认识显然是模糊的、不深刻的，但毕竟萌发了开放的思想意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逐步兴起的洋务运动，使“师夷长技”的思想变为具体行动，特别是涌现了一批有思想、敢议论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理论家，使开放意识成为朝野上下一股不大不小的新型思潮。这批改良主义思想家大都有一定的世界知识，不少人曾亲自涉足西方，他们善于从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从中外对比中去论证清廷的改革方向，所以他们的开放意识就有一定的哲理性和说服力，能够给沉闷的思想界注入新的生机。那位近代率先赴美留学的容闳就曾多次呼吁中国开放，并具体提出中外联合开发长江、中外合资修铁路的建议。他经过多年努力 先后带领詹天佑等 120 名幼童赴美留学，是清廷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容闳的基本思路是，把美国式的西方文化灌输于中国，使清廷这样的封建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西学东渐记》）曾经游学欧洲的王韬 有较系统的开放“理论”。他明确指出：“当今之时 处今之世 固非闭关自大时也”（《弢园文录外编》）在王韬看来，“今之天下 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不患西人之日横 而特患中国之自域”（《漫游随录》）王韬这种发人深省的见解集中代表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呼声。试翻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汤震、何启、宋育仁等人的文集、日记、书信 几乎都在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开放。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关于开放的论述占相当比重。他的结论是：中国欲自强，只有开放，特别在各国侵略中国之际，“我不能闭拒阻遏也”。如果不向西方各国学习，“知我之短 知人之长”那是“粉饰自欺”就是尧、舜活到现在，“终不能闭关独治”。如果将改良派的这些言论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发现他们的开放主张基本包括了三个层次：一是改变了传统的从中国出发去观察世界的思维逻辑，从世界来看中国，把开放作为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世界趋势加以论证，说明清廷能否开放是顺应世界潮流的大问题；二是将开放作为一种中国自我生存、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竞争的重要手段，反复强调把西方“长技”学到手 与外人开展“兵战”、“商战”乃至“学战”，也就是中国

应该兵强、国富、文化发达 三是把开放的内容具体化 包括引进技术、扩大贸易、合资办厂、开采矿山、派留学生、办学堂、译西书等一系列措施，“出于夷而胜于夷”使中华民族后来居上 这种开放意识已具有浓厚的近代色彩了。

戊戌变法将人们的开放意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具体标志是将对外开放和内政变革紧密结合在一起 以开放促进变法 以变法保证真正的开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改革家在激烈呼喊开放的同时 要求清政府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内政。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写的七上皇帝书 严厉批评了闭关自守的守旧思想 反复论证了在各国“争雄角智”的时代 中国只能作为竞争中的一员 走向世界 发愤图存。他认为“中国今日 已非一统闭关之时”，“图保自存之策 舍变法外无他途”。凡是西方各国的长技 都应该“通晓而摹仿之”“凡是‘万国之美法 必采择而变行之’”（《上清帝第六书》），梁启超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 认为封建时代“闭关画界”不与各国往来 还勉强可以存在下去 如今处列国竞争之中 绝对不行。地球上各国相通 这是“天道也。人力虽强 可逆天乎 故欲闭关自守以冀绝外患者 中国人至愚极陋之言也”（《梁启超选集》第 66 页），处在世界竞争中的清廷 变亦变 不变也得变 否则自取灭亡。敢于“言人所不敢言”的谭嗣同在《仁学》中严密论证了闭关自守使中国日益沉沦的历史教训 指出“今欲闭关绝市 既终天地无此一日”。他认为中国要办的所谓“洋务”其实都是必须办的实事。不仅政治、经济上要开放 社会风俗文化也应与西方沟通，取长补短。严复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当时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他的开放言论深入到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思想文化领域等较高的层次 给中国人以新的思想启蒙。事实上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开放思想 是要从观念上和思想政治领域来一次彻底的变革 使中华民族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康有为的“博爱”梁启超的“民权”谭嗣同的“平等”严复的“自由”构筑了一个中国式的资产阶级思想框架。这不仅引导了戊戌时期一代人的观念更新，而且为 20 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动提供了理论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讲 孙中山的开放思想 就是戊戌时期乃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批判闭关自守、重新认识世界的继续和

发展 他的名言：“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是对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改革家开放意识的高度概括。

三个特点

近代改革家的开放意识有较明显的三个特点：

1. 对外开放和内政改革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

在近代中国，凡是主张改革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是积极宣传对外开放的。从魏源到康有为，虽然他们对外开放的具体表述有较大差异，但总是和呼吁清廷维新变法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改革家虽说没有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到改革和开放的内在联系，可是近代中国的特定现实，使他们无意识地在宣传开放的时候，成为批评时政、要求改良的激进的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开放的程度决定着改革思想的深度。这是因为，当时的清廷百孔千疮，远远落在了欧美各国的后头，这些改革家放眼世界后，深深地感到中国简直没法和西方相比，于是不甘落后的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油然而兴，对清廷的问题看得也越来越深，仿照西方改革的要求自然十分强烈。于是他们一面呼喊“救亡图存”，一面要求“借法自强”。近代改革家的维新方案主要是通过研究西方获得的，他们认识社会的基本方法就是中外比较。所以，是否坚持向西方学习，就成了能否成为一位近代改革家的决定因素之一。而内政改革思想的发展程度又反过来促进和制约开放思想的发展。因为改革是对外开放最具体的保证，改革的深度又决定着开放的广度。近代改革家在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时期改革的要求不同，他们开放意识的内涵和程度也很不一样。从魏源到康有为的发展轨迹反映了改革和开放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2. 忧患意识和恐惧心理交织在一起

中国近代的改革家都是忧国忧民之士，他们害怕中国在殖民主义的入侵中亡国灭种，也忧虑清廷江河日下，平民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种忧患意识是他们宣传中国开放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他们在表述开放思想的时候总是伴随着民族危亡和国家衰落的沉痛呼号，使开放意识包裹在爱国热情之中。这虽然使他们的开放宣传富有了感染力和合法性，但这中间始终充满了一种恐怖感，就是惧怕守旧派说他们是“用夷变夏”，即用西方资本主义去取代清廷的封建专制制度。守旧派恰恰看破了这一点，动辄攻击这些人是用“夷道”来改造中国，旨在使清廷皇冠落地。这使康有为、梁启超等张口结舌，无力回击。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用夷变夏”还是“用夏变夷”这是一个触及社会制度和传统思想的大问题。谁讲“用夷变夏”就有灭顶之灾。于是改革派忧心忡忡，不敢正面涉及这一问题，只能反复强调开放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清廷统治，学习西方是把欧美那些本来是中国的“良法”取回来。薛福成等人总是讲中国开放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谭嗣同也说“西法皆源于中国”“中国效法之”是“收回所固有而复古矣”。梁启超还专门写过一篇《古议院考》，论证西方的议院是从中国古代学来的。其实这是改革家为了消除恐惧心理和排除守旧势力围攻的一种手段，他们自己也知道“西学源于中国”是讲不通的。梁启超的《古议院考》发表后，严复曾致函批评。梁在回信中说：“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梁启超选集》第40页）。可见梁启超是被迫为之，其中有难言的苦衷。康有为也说：“中国败坏之由，外夷强盛之故，非不深知，实不敢言。”（《戊戌变法》第2册，第205页）这种没有言论自由的状况，不仅使这批改革家心灵上受到压抑，瞻前顾后，而且影响了他们开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自然也有阻于近代中国人的对外开放步伐。

3. 实用有余 理论不足

中国近代改革家的言论多为某一具体问题而发，较为零乱，缺乏系统性。鸦片战争后的开放宣传集中于如何反对英国侵略；洋务运动时的开放议论主要是外交、中外贸易、开工厂、修铁路、办学堂等，没有超出洋务事业所涉及的范围；戊戌时期的开放视野较广阔一些，但基本上是在维新

派的具体变法上打转转。这些改革家讲开放主要是求实用，开放后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例如中西文化的冲击、清廷和欧美的社会制度、“夷夏之变”、道德观念、中外合资后的经济发展前景、中国开放后与西方的各种关系等等，他们很少触及。这就使他们开放的言论缺少深层的理论概括，也减弱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清廷在开放问题上十分被动；二是近代中国问题成堆，灾难深重，变化迅速，改革家几乎来不及进行系统的理论思维；三是当时的文化环境低劣，使改革家不能汲取广博的文化营养，文化和理论素质不高。这就决定了近代改革家的开放意识处于初级起步阶段，有开拓之功，无成功之力。

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

世界意识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条件。欧洲人出于开拓市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以及传播宗教的“狂热”，早在 15 世纪就研究世界，四出探险，逐步开创了欧洲影响全球的近代世界新格局。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缺少生机与竞争机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中国人的视野，影响了中华民族世界意识的形成。中国古代虽然有张赛通西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缺乏寻求市场、参与世界贸易的持久的动力，并未导致中国人走向世界。直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为了反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先进的中国人才从自卫的角度出发，被动地去探求世界，研讨新知，向中国民众介绍世界，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本世纪初年，中华民族涌现出孙中山这样能够立足世界去观察东方和西方的伟人，他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打开了一代中国人探讨世界和中国的新思路。回顾近代中国人世界意识形成的曲折过程，将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剧痛，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世界

古代的中国人，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充满了对世界的幻想和憧憬，出现过各种离奇古怪的神话传说，但并没有科学的了解。1584 年，广东肇庆刻印了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从此中国有了第一张世界地图。1623 年又出版了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该书迎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以《周礼·夏官》所记“职方氏”主管地图的习惯来命名，很受中国知识界的欢迎。通过这本讲世界地理的书，中国人开始有了五大

洲、三大洋的概念 欧罗巴、亚细亚、阿美利加、大西洋等名词逐步传播开来,一些有识之士也尽其所能地介绍世界地理知识和西方的科技文化 哥伦布、《几何原本》已为少数中国士大夫所熟知。但是 明清之际中国封闭的政治结构和经济模式 对外部世界并无多大需求 多数官僚士大夫夜郎自大的文化心理又对西洋文化极为排斥。守旧文人杨光先甚至提出宁可使中国人不知道西方世界 也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这种状况阻碍了世界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历史又缓慢地推移了 200 多年后 当认识世界已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才重新研究西方。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剧痛,出现了一股研究世界和边疆史地的热潮。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为了反抗英国侵略,他几乎日日“刺探西事”。他组织了一批了解西方、外语较好的华侨青年翻译传教士的报刊 搜集西方各国的资料。他提审战俘 和传教士交朋友 千方百计探讨英国的内政和外交。他还从传教士伯驾那里得到了一台地球仪。在被发配新疆的途中,他将搜集到的有关世界地理的资料送给了好友魏源,劝他写一部讲世界的史地书。1842 年 经过多年刻苦努力 魏源出版了他的《海国图志》。这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启蒙读本 而且对日本人走向世界也发挥了作用。1848 年 徐继畲刊印了他的《瀛环志略》 进一步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精神食粮。在此前后,一些讲欧美情况的生动有趣的图书如《海录》、《西海纪游草》、《海岛夷志》等陆续印行。洪秀全在鸦片战争后对西方的探讨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也看到了中国以外的外部世界,太平天国对待西方各国就较清廷开放得多。至于 1847 年容闳赴美留学,则开创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新途径。

总之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虽然是有限的 并带有猎奇性 但毕竟呼吸到了一点儿新鲜的空气 其意义在于:一、通过研究世界,个别敏锐的思想家如魏源等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为近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改革思路以及深受林则徐、魏源影响的冯桂芬在鸦片战争后提出的“主以中学 辅以西学”给中国思想界以极大震动。和魏源齐名的龚自珍由于在 1841 年早逝,很少了解

方世界，他的改革方案就只能在旧式的框架中打转转，并无新意。可见，了解世界和不了解世界大不一样。二、通过世界知识的传播和鸦片战争后‘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马克思语）基层社会主要是东南沿海及一些大城市；‘洋人’、‘洋货’、‘办洋务’等广泛流传。这些通俗的言词标志着中国人对世界的关注，广大中国民众认识世界是从“洋”字开始的。

一批改良思想家的产生 为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尚属萌发期 那么 洋务运动时期则步入扩展期了。由于办洋务和西方世界发生了较多的经济联系 办外交、派留学生、建洋学堂、译书等又与世界各国有了政治和文化交往，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采取多种方式去了解西方。了解世界首先需要语言交流。冲破守旧派的重重阻力，1862 年在北京设立了中国第一所外语学堂——同文馆，后来又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外语学堂。不少洋务官僚对外语很重视 曾国藩、李鸿章等都严令自己的子女苦学外语。曾的儿子曾纪泽年近 40 还学英文，后来竟大致过关，能和外人交谈。翰林出身的吴子登用中文注音攻读英文 口虽不能讲 但可阅读。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建立时曾专设翻译馆，广收外语人才。光绪皇帝对外语亦感兴趣，同文馆毕业生张德彝专教其英语。他也梦想出国观光，可惜遭慈禧太后的反对终未成行。自 1866 年斌椿率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后 陆续有一些访问团走向欧美，清廷的龙旗开始飘扬在西方世界。1876 年郭嵩焘出任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外交公使后，外交使节不断步出国门。这些外交使团对中国人认识世界以及给清廷官员‘洗脑筋’大有好处。那位陪同郭嵩焘做驻英副使的刘锡鸿 顽固守旧 但当他了解世界的走向之后 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主张对外开放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可见 随着人们世界意识的扩大 新观念就会清洗旧脑筋。这种思想更新 点燃了中国变革的希望之光。

洋务运动时期人们世界意识增强的最重要成果，是产生了一批能够

从中西文化对比中研究中国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有新颖见解的改革方案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作为洋务派重要理论家的薛福成，不仅呼吁清廷对外开放，声言“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而且批评洋务运动单纯学西方技术而不进行内政变革，主张推行“君主立宪”的建国方案。那位因上书太平天国而出逃香港、后又作为访问学者漫游欧洲三载的王韬，既苦钻西方文化，又协助外人译“四书五经”，向世界传播中国经典。他主编《循环日报》，介绍世界知识，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是一位“曾经沧海”、“放眼全球”的新型思想家。由实业家成长为著名思想家的郑观应，注重世界大势和市场竞争，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和弘扬中国传统。他的《盛世危言》批评时政切中要害，介绍西方恰如其分，能够从中国历史变迁的“纵”的方面和东西比较的“横”的方面去提出问题，集中代表了这批改良主义思想家对世界和中国的新思考。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何启的《新政论议》、陈虬的《治平通议》、陈炽的《庸书》等都善于从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从中国的实际提出改革方案。他们的新思想来源于睁眼看世界和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其为后来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初 近代中国人的 世界意识已基本形成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 20 年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也丰富多彩了。戊戌变法来了一次思想解放，1901 年后的“新政”在客观上引发了资本主义新经济的大发展，1905 年前后留学潮的突起和新学堂的广泛建立，孙中山借世界潮流来推进中国的进步则启发了一代青年。很多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已注意到了世界的动向。康有为劝光绪皇帝“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梁启超要借世界学术文化“陶铸国人之精神，冶炼国人之灵魂”，陈天华“话说天下大势，首先从欧洲讲起”，邹容著《革命军》评述了世界革命的进程。即使一些新建的学堂，也习惯于挂一张世界地图或购一台地球仪。湖南长

沙一青年学生看了地球仪后 写下一首打油诗：“若把地球来端详 中国并不在中央 地球本是浑圆物 谁在中央谁四方？”这一青年讲中国不在“中央”表明了世界地理知识已开阔了青年学生的视野。概括地讲，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在这时已基本形成，并注入了特定的内涵：

1. 注重研究世界潮流。20 世纪初年的思想文化界，世界潮流是其“热门”话题。翻开那时的报章杂志或各类新书，谈世界走向的占相当比重。就思想流派而言，当时世界流行的派别几乎都有所涉及，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重商主义等 很多人都作了评介。有人甚至预言 20 世纪将是社会主义走向全球的黄金时期。思想敏锐的中国人这时已如饥似渴地捕捉世界潮流。

2. 寻求中国在世界的位置。通过世界潮流的研究，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找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特定生长点。他们形象地称中国为地球上的“睡狮”，要勒斥它，唤醒它，并寻找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良方。试看孙中山的演讲和梁启超的宏论，他们总是立足世界，评论中国，他们已经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以中国为本体的思维方式，而是从世界看中国。

3. 初步具有了世界大市场的观念。孙中山等人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已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从本质上是争夺市场，世界各国的竞争是围绕市场而展开的。在世界连为一体的时代，没有市场竞争力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

4. 呼吁参与世界竞争。20 世纪初的多数中国人把世界看为一个“竞技场”并认定中国则为“各国竞争之中心点”。《第一晋话报》的一首顺口溜讲：“如今世界非从前 全赖人为不赖天 生存竞争似烈火 优胜劣败理如山。”从严复所译《天演论》的“物竞天择”的原理出发 先进的中国人已意识到中国必须参与世界竞争，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一个国家在世界的地位是由其参与的程度来决定的。

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理性思考

明清以来特别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无法抗拒的挑战。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及其与之相关的古今文化关系，成为人们思考与解决的核心问题。中西、古今之争也变成了中国文化变迁中的主要内容。中西和古今虽然可分为两大问题，但古今问题是由中西问题而引起的，中西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如何解决中西之争，即如人们常说的如何向西方学习，如何向西方寻求真理，就成了近五百年来尤其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努力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教训，不能看得一无是处，也不能讲多么成功。但从总体上去观察，理性而不是以激情去论事，就可以发现，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中国人从来没有像日本人那样认真过。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表现出来：

1. 一直处于被动状态。1793 年马嘎尔尼来华，是中国与西方建立联系、开放改革的绝好时机，但那时的乾隆皇帝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在国将不国的生死存亡威胁下，清政府才搞起了洋务运动，不过学习的领域也只局限于清廷能接受的范围。20 世纪初清廷推出的新政，较大地仿效西方进行改革，但也是在经历了八国联军战争的剧痛，实在没有其他任何办法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为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后来的向西方学习运动，都和救亡图存紧密联系在一起。基本都是被逼到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被迫开放，被迫走向世界，引进西方先进的东西。这种被迫的学习西方，虽然有波涛，也有回流，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只能事倍功半，不能和日本的学习西方相提并论。从深层上找原因，这是由中国人的世界文化中心地位思想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所决定的。

2. 图省力 间接学习。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认为日本强大了，觉得日本人学习西方比中国人好。因为日本的母体文化是以中国为蓝本的，许多人认为学日本比学欧美要容易，要见效快。于是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很多西方的经典图书、教材、各种理论等，都从日本翻译过来。甚至西方的一些名词术语，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科学等词汇皆来自日本。这样的学习，不但容易失真，而且会走样，误区显而易见。1917 年俄国革命成功了，又觉得俄国人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成功了，我们只要向俄国学习就万事大吉了。“以俄为师”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其中成功的地方当然不少，但许多教训也刻骨铭心。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今天我们纠正起来都感到积重难返。这种间接学西方的教训应该好好地总结和认真研究了。天下事就是这样无情，老老实实，下笨功夫，往往比老想省力“取巧”成功得反而要快。

3. 找公式，划比例。好心的思想家、政治家总希望找到一个向西方学习的简单的公式，划分出来学习什么，不学习什么，扬弃多少。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对西学实际上还比较陌生，但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公式。不久冯桂芬又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洋务运动则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事实上，这时期中国人对西学的了解是很有限的。还没有透彻地弄清楚西学，就要去分何为体，何为用，当然是无的放矢了。至于用什么样的西学辅以中学，用西学的什么“用”来保卫中学的“体”，就更是一笔糊涂账。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在解决东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上，许多人又试图用几个字，或者几句话，来概括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目的是只要抓住了这个公式，一切就迎刃而解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再论述，西方文化是自然的，中国文化是人为的；西方文化是积极的，中国文化是消极的，西方文化是动的，中国文化是静的，西方文化是爱的，中国文化是敬的，等等。初看起来，这些话颇深刻，但仔细去研究，则相当不准确。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非常博杂的，一两句话是讲不清楚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去广泛研究，彻底开放，自由选择。真正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的真谛后，才可以在科学的选择中加以吸收。不想